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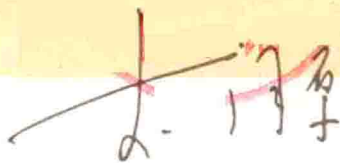
李泽厚

李泽厚对话集
九十年代

中华书局

李泽厚对话集

九十年代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 / 李泽厚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8

ISBN 978 - 7 - 101- 10322 - 9

I.李… II.李… III.哲学—文集 IV.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162776 号

-
- 书 名 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
著 者 李泽厚
责任编辑 陈 洁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½ 插页 6 字数 215 千字
-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10322 - 9
定 价 38.00 元
-



1990 年李泽厚在家中。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1992 年李泽厚于德国图宾根大学任教。



1992 年李泽厚在德国教学期间，与夫人顺访柏林。



1991年李泽厚与孙长江、余敦康、汤一介、袁伟时、庞朴、沈善洪（从右至左）在孙长江家合影。



1993年在美国，林间漫步。



1995年，李泽厚与何兆武在李家中合影。



1993年李泽厚与余英时合影。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序

承中华书局雅意，得此合编《对话集》。说明三点：

一、均系发表过的答问、访谈、对话，未加改动。标题为原编者所拟，亦不变更。

二、《与刘再复对谈》，未能全部收入，收入者亦多删削，原因“你懂的”。同此，各卷被删削处不再恢复。

三、《哲学登场》两本合为一册，《附录》略有迁移增补。

覆瓿旧谈，居然再现，重复唠叨，应属可厌；耄耋之年，无力再练，留此印痕，或为纪念？

谢谢编辑申作宏先生。



2014年3月于科州博城

《李泽厚对话集》

李泽厚 著

《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一）》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二）》

《李泽厚对话集·浮生论学》

《李泽厚对话集·与刘再复对谈》

《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

目 录

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 (1992)	1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 (1994)	8
哲学是一种视角的选择 (1994)	34
文化心理结构与心理文化结构 (1994)	53
美是自由的形式 (1994)	65
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 (1994)	83
美学——中国人最高的境界 (1994)	109
治学之路：微观宏观之间 (1994)	129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1994)	145
如何活：度与情 (1995)	149
中国是从前现代进入到现代 (1995)	195
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 (1995)	228
“我的书是给人以启发的” (1998)	241
伟大的真理就是简单的 (1998)	247
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和艺术 (1999)	273
“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 (1999)	290

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

——答香港《信报》记者张一帆问

张一帆（下简称“张”）：你曾被世界上不少著名学者誉为中国 80 年代的思想启蒙家，是 80 年代的梁启超，你对自己有一种怎么样的历史使命感？

李泽厚（下简称“李”）：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我很高兴，我不愿意掩饰。另一方面也感到不敢当。

这个说法最早是香港有人在文章中提出，说我是当代梁启超。

张：你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不容置疑。但是，也有青年向你的一些观点提出挑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原北师大青年学者刘晓波，他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一书主要批评了你的“积淀说”，你认为他的批判是否有道理？

李：我认为没有道理。我始终是受两面夹攻，一方面正统派说我离经叛道，太激进；而激进派又说我太保守。

刘晓波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见，代表了一批激进青年的看法，认为我保守，批判我。这是很正常的。

我虽然不同意刘晓波对我的批判，但我不生气。刘晓波的

文章我认真看过，当时有朋友劝我答复他，但我没有写答复的文章，原因我已说过，因为他所反映的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有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从学术性来讲，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刘晓波自己也说，他不遵守形式逻辑。有人指出他的文章里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说矛盾没有关系。

在文学作品里，做诗人可以有矛盾，情感上的矛盾是很多的。但是，搞科学、做学问、写论文，起码应该能够自圆其说，至少不能产生形式逻辑上的矛盾。这是学术的起码要求。所以，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他的文章在学术上就没有什么价值。这我也早说过。

他反映的一代年轻人的情绪，对社会的不满，要想激烈变革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个情绪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

张：今年年初你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目前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你对这个看法有何修正？

李：这篇文章完成在2月初。邓小平南行讲话，我还不知道。

最近我没有回国，但各种迹象表明，改变很大。所以，我的估计及看法与一年前有些变化。

张：哪些变化？

李：我一直担心中国发生内战。辛亥革命的后果就是军阀内战。现在来看，假如经济发展，像我听到的那样，继续维持几年，那么会是另一种情况。经济会消除很多东西，消除内战，消除革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这也不是绝对的。我记得托克维尔200年前说过，革命不会发生在最贫困的时期，往往

会爆发在富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贫富不均，贫困的阶层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意，这是一个危险因素。

另外，商品经济一定会造成人口的大量移动。中国人口这么多，流民几十万，甚至可能数百万，这也很危险。

张：你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海峡两岸当政者都不能接受的。客观而言，你不认为辛亥革命确实结束了封建统治，改变了中国历史？

李：辛亥革命当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是我想，当初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对中国可能更好。中国现在可能已经进入现代化了。

张：根据呢？

李：清朝政府虽然腐败，但在相当程度上它能控制局面，如果当初立宪派即改良派胜利，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辛亥革命相当偶然，没有必然性。当时立宪派的力量很强，尤其是在地方。

清朝政府已经着手改革。所准备的班子提出的改革措施相当不错，按照他们提出的改革步骤，至少可以消除辛亥革命以后的那种混乱和军阀割据。

我最怕内战。一打仗，任何建设都不可能。当时改良尽管慢一点，但可以抢在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之前，把中国引上现代化的道路。

我在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对“革命”表示了我的怀疑，但当时还不敢仔细想、公开说。

我不是空洞地一般地否定革命，对革命要作具体分析。但

是中国的革命，是被辛亥革命“革”坏的，以后就不断革命，不断变坏。

在中国，“反革命”是最严重的罪。我想，革命为什么不能反呢？革命为什么一定是神圣的东西？事实上，从历史上看，革命并不一定完全正确。

周扬“文革”之后复出，检讨了很多错误，但有一条，他说问心无愧，他是为了革命。好像一革命，就能消除了他许多错误。“革命”至今在大陆还是一个很香的词。（在台湾可能也一样，“国民党”不是也不愿放弃“革命”政党的称号吗？）

张：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不断，爆发革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政教合一”、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合而为一所使然？

李：中国的症结是政教合一。中国的“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是儒教。儒教是道德哲学，是入世的。政治与伦理在中国不分家，伦理就变成了“教”。伦理总是与政治搞在一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情况更严重。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也是不分家的，是意识形态领袖，也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直想做革命导师。“四个伟大”，他只要保留一个。

张：我注意到你最近一直在呼吁要有一个美的梦，共产主义作为19世纪的梦，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已经破灭，中国难道还要去制造一个类似这样的梦吗？还需要这样一个梦？

李：我讲的梦，不仅是指中国，而是指世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梦，有些人愿意做梦，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我所讲的梦，不是讲去如何设计一个社会，设计社

会应该怎么组织发展、建立一个乌托邦工程。经济发展了，而是说，吃饱了肚子，要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人活着为什么，就是为了当下即刻的欢乐？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关于明天的梦呢？我看还是可以的。

我不想建立什么思想体系，如果有人若想建立，也可以。但建立思想体系不一定要去搞统治，更不要按照乌托邦的理想去搞一套实践的方针。

张：美学界一直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在大陆，不允许有唯心主义存在，这是不是对学术的一种反动？

李：当然是一种反动。美学界的讨论开始于50年代。在其他领域往往是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一家说了算。但在美学领域，官方始终没有说话，所以一直是三种意见。因为美学比较远离政治，与文艺理论不一样，讨论一些抽象的概念。

但是，在当初那个背景下，每个人都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包括朱光潜先生在内。

现在回过头来，唯心主义为什么一定错了？唯心主义有什么不好呢？

宗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但它对社会能起积极的稳定社会作用。

任何问题简单化、政治化之后就不是学术性了。

张：在我的印象里，你从50年代开始就坚持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现在有改变吗？

李：没有。我还是认为，美与人的实践活动有关系。人的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美是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的，所以是唯物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应该在严格规定意义

条件下使用。

张：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美学界的泰斗，贡献巨大，你们之间曾有过论战，你对朱光潜的学术思想有什么评价？

李：朱先生的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在30年代影响很广泛，对中国的美学界是具有开创性的。他做了大量翻译荟萃工作，对黑格尔的《美学》、《歌德对话录》的翻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多，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时候，搞美学的人都不知道宗白华。但是他的书80年代初出版之后，影响很大，他对中国的文艺作品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宗白华的美学地位已经超过朱光潜。

张：你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缺少的是康德，而不是黑格尔。康德对哲学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许多问题，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在中国缺少提出问题的人？

李：我出版过一本书——《批判哲学的批判》，主要是研究康德的。

在西方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过一个题目——“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当初我说，假如我来回答这个题目，我会说，要康德而不要黑格尔。后来，这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指责我是修正主义、新康德主义。

我也不是不要黑格尔，我本人也受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的一些思想也是很精彩的。

我认为康德在中国被埋没的时间太久了，讲康德的文章在中国极少。当然，他的书很难读。

康德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很大，很多自然科学家根本不看黑

格尔，只看康德。因为康德的一个特点，像你所说，提出了很多问题。黑格尔自称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用辩证法变一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变戏法，哲学上的变戏法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康德则比较老实，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到现在为止仍没有办法解答。

（原题为“中国要变，但不要革命”，
原载香港《信报》1992年12月21—22日，有删节。）